



“两新”政策扩围 拓展消费新空间

全国两会前夕，多位经济学家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献计献策。他们认为，“两新”政策作为促消费的重要抓手，成效显著。未来扩内需要从增加居民收入、推动服务消费升级等方面入手，建议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适度放宽准入，放松价格管制，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从而拉动中高收入人群的消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彩云

“以旧换新”推动零售消费反弹，盲盒消费、陪伴型玩偶等情绪消费商品销售热度不减，AI键鼠、AI耳机等数智产品销售火爆，老年人消费稳健增长……多个新趋势、新特点为我国2024年消费市场留下注解。2025年开年，“两新”政策加力扩围实施，中国消费新空间持续打开。

“当前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仍然是促进消费持续增长的直接抓手。”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近日举办的“经济每月谈”上，京东集团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分享了一组数据：去年10月，与“以旧换新”密切相关的家电零售同比上升39.2%、文化办公用品上升18.0%、家用上升7.4%、汽车上升3.7%。上述四类合计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2个百分点。“总体而言，以旧换新扭转了去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下滑的趋势。

势，和其他政策一起推动中国经济在三季度末和四季度企稳回升。”

在这场临近全国两会的交流活动上，来自宏观经济领域的多名专家为提振消费、扩大国内需求支招。这是2025年经济工作九项重点任务之首。2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

今年扩大国内需求更加紧迫

“当前的需求不足较为突出地反映在一些中心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上，也体现为全国价格持续走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王一鸣在现场分析，虽然今年1月受春节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有所回升，但2月以后可能还会适度回落。此外，需求走弱也正在向供给端传导。

在王一鸣看来，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明显增多，不利的影响可能加深，扩大国内需求会更加紧迫。“扩大内需依然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制约，持续3年多的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是造成投资消费、地方财政、金融信贷等变化的重要原因。”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则提到总需求问题背后是亿万个主体的互动行为，总需求不足是一个总量问题，其复杂性远超个体生活经验和微观企业视角。

他以债务问题为例说，对于家庭和企业而言，往往希望债务越少越好，但对于国家而言，适度的债务是国家发展的需要，过多或过少都会带来严重问题。而有关收入的视角差异则更加明显，“个体通过努力工作可以在竞争中获胜并增加收入，但对于国家整体而言，总收入的增长并不完全依赖于个体的努力和生产效率的提升，而是与信贷和资本市场有更密切的联系。”张斌说。

他认为，市场需求不足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影响，表现为市场失灵，即当经济运行的一类主体减少支出，就会依次传导给其他参与主体，这可能会导致各类主体资产负债表之间的负向螺旋循环。

对此，这位较早为如何走出需求不足发声的学者建议从逆周期政策和结构性政策方面进行调整。“短期内走出需求不足的局面离不开投资，消费和投资在当前阶段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张斌

呼吁政策制定者在关注消费的同时，要重视投资的作用，特别是在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包括旧房改造，建设图书馆、医院、体育场馆、地下管网等，“这些投资既改善民生福利，又能带动收入和消费增加。”

在结构性政策调整方面，张斌认为，要在收入端更好地进行二次收入分配，“财政要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保障，要推动三次产业增长更平衡。”

让更多收入流向消费者

实际上，去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预告今年宏观政策的政策取向，明确提出“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加大财政支出强度惠民生，成为今年宏观政策调整的重头戏之一。

“财政支出若能更多向消费和居民收入倾斜，则更有利于提振中国的消费需求。”沈建光以以旧换新政策为例说，该政策为治本政策的推出提供了时间和空间，“特别是2025政策加力扩围之后，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的销量已出现大幅增长。”

他还提到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有关措施应该尽快落地。”在沈建光看来，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不仅可以直接增加居民部门收入，增加消费支出，还可以通过降低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通过杠杆效应进一步刺激消费。

多次呼吁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需求不足，其实指的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由支出欲望和购买力相结合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归根结底是个收入分配问题，因此，根本的解决方案是让更多收入流向消费者。”徐高认为，调节收入结构是上策，应推动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增加分红，作为财产收入的主要资金来源，建议今年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社保基金划转。

此前，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于2019年全面推开。

2023年度国有资产综合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末，我国国有资产权益总额102万亿元，全国国有资产权益总额30.6万亿元，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净值51.4万亿元。徐高认为，如果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社保基金划转，并且将这部分新增资金投资产生的收益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将大幅带动全社会消费。

发力惠民生

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大于名义GDP增速，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促形成消费与投资的互动机制……聚焦提振消费，多个改革方向被提及，满足民生需求是共同出发点。

对于服务消费的发展，王一鸣建议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适度放宽准入，放松价格管制，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

从而拉动中高收入人群的消费。

“近年来商品消费相对饱和，服务消费持续稳定增长，消费者对服务消费需求提高。”王一鸣建议在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适度放宽准入，放松价格管制，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服务消费领域，同时理顺服务价格，增加差异化的服务供给，满足中高收入群体多样化的服务消费需求。

他还建议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落实常住登记户口制度，“后一项可以将相关人群的消费意愿提高30%。”

从去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到今年2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服务消费有关工作，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利好信号持续释放。2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推动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支持服务消费场景创新、业态融合、产业集聚，完善文化旅游、餐饮住宿、养老托育、数字消费等领域标准。

在创新提升服务贸易上，该会议提出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电信、教育、文化、医疗、金融等领域研究推出一批新的开放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不止一位专家表示“消费与投资并不对立”“增加有效投资能够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从业人员收入和消费能力”。

在徐高看来，短期内提升消费，还需要宏观政策去刺激消费之外的其他内需，也就是通过投资来创造需求、稳定增长，短期内必须接受较低的投资回报率。另外，房地产政策也需要进一步发力，通过化解房地产的矛盾稳定宏观预期。

“在整个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利率敏感性下降的背景下，财政政策才是稳定的政策核心。”徐高说。

图片新闻



3月2日，内蒙古呼和浩特，民众在商场内选购黄金饰品，近日，黄金价格屡创新高后，“金价大跳水”冲上热搜。

中新社记者 刘文华/摄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跑出京津科创协同“加速度”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胡春艳)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由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政府联合中关村发展集团共同主办的“科创协同聚合力·产业链融合未来”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推介会暨重点项目签约仪式近日在北京举行，300多名京津两地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协同创新路径，共谋未来发展蓝图。

距离北京不足百公里的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十年间，“从0到1”的创新策源，再“从1到N”的产业跃迁，以创新链耦合、产业链共生的新型协作，由一方阡陌村庄已发展成为“科技新城”，成为京津科技创新协同和产业链融合“试验田”。

中关村发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潘金峰表示，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平台，是京津两市携手推进的重大合作项目。今后将充分利用京津平台优势，持续推动政策突破，培育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提升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品牌影响力。

近年来，宝坻坚持举全区之力建设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建立京津两市市级层面会商协调机制，发布市区两级支持科技城高质量发展的22条政策措施，解决了一系列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同城化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为整体开发建设、产业组织、城市环境综合配套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宝坻区聚焦打造“类中关村”的产业生态，将北京中关村推出的五大类20大项203个小项服务全部移植到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建立起涵盖科技成果转化、公共实验检测、金融超市等“十大服务平台”，成立政务服务“陪跑工作室”，推行“654陪跑”政务服务机制，形成了“签

约即挂牌—拿地即开工—竣工即投产”的“一站式”常态化服务模式，不断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满意度。

宝坻区副区长、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党工委书记王浩表示，2025年将继续完善“654陪跑”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服务，解决其难点、堵点问题，持续提升金融、招商、科创、人力资源等服务水平，塑造科技城品牌。全力推动南开中学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学校竣工，为引才聚才解决后顾之忧。

活动现场进行了重大项目集中签约。计划总投资额为207.88亿元的45个优质项目正式签约落户，除京津冀项目外，诸多来自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项目也纷纷落户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签约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近年来，“北京研发、宝坻转化”的模式在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愈加成熟。现如今，科技城已累计吸引1800余家市场主体入驻，培育出27家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17家雏鹰企业、12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种子企业、4家瞪羚企业。无人驾驶、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的应用场景纷落生根，使科技城的“科技成色”不断增强，奔跑的速度更快。

天津市宝坻区委书记毛劲松表示，宝坻区将坚持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继续举全区之力建设好京津中关村科技城。聚焦打造“类中关村”产业链，努力提质升级“十大服务平台”，用好数据算力资源，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握手通道”等机制，加快建设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积极创造条件让各类市场资源充分对接，以宝坻之为，持续助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按照轻重缓急制定分阶段控制目标，对禁采区、限采区进行分区管控。

比如，在生态脆弱且超采严重的区域，优先设定严格的禁采措施，逐步减少地下水开采量；在用水需求相对集中但超采情况较轻的地区，设定合理的限采指标，逐步引导用水方式转变。同时，要警惕水位快速回升带来的次生风险，比如地下建筑物安全、防控土壤盐渍化等。

“针对我国不同地区的水资源禀赋差异，要抓住不同区域的主要矛盾，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治理策略。”赵勇说，在北方粮食主产区，要重点解决农业用水问题，实施农业取水精准计量和管控，调整种植结构，发展农业高效节水技术、实施水源替代等措施；在南方丰水区，水质性缺水与局部超采并存，则要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划定饮用水源地保护区，推广“海绵城市”技术增加雨水下渗等措施。

针对目前我国地下水超采还存在的问题，陈飞建议，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以最新的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成果为基础，编制新一轮地下水超采治理方案，修订完善地下水禁采区、限采区，在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地下水超采治理的支持力度；强化地下水监管，严格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按照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和水位控制指标强化地下水开发利用管控，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布局和用水规模，以农业开源地下水为重点，加快地下水取水计量体系建设；加强科研与地下水管理融合，加强重力卫星遥感、穿透式地质雷达等技术应用，深入开展地下水运动规律研究，进一步提升地下水管理精细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新一轮超采区已划定 地下水治理需久久为功

新一轮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成果显示，虽然近年来开展的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成效显著，但平原区地下水超采区面积仍有26.76万平方公里。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任重道远。专家建议，以最新的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成果为基础，编制新一轮地下水超采治理方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婉

作为主要的淡水资源，隐藏于地下岩石隙中的地下水，为全球数十亿人提供着饮用水和灌溉资源。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生产生活需求的不断增长，地下水的可持续利用已然成为全球至关重要的问题。

近日，水利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了《全国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成果》(水资源〔2024〕349号)，公布了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超采区划定成果，为我国地下水超采治理提供了新的依据。

我国划定新一轮超采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地下水管理与保护工作逐步加强，地下水超采治理有序开展，近年来取得显著的治理成效，地下

水超采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

2021年，我国第一部地下水管理条例——《地下水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颁布施行，为地下水管理保护和超采治理夯实了法律基础。同年，依据《条例》规定，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了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超采区划定工作，全面收集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34929眼地下水监测井数据，历时3年，充分调动200余家单位、2000余名技术人员参与其中。

与2015年全国地下水超采区划定结果相比，全国地下水超采区面积总体下降，超采量、超采程度显著降低，严重超采区面积较上一轮减少8.83万平方公里，减少51%，反映了近年来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逐步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地下水治理是全球难题

一份来自《自然》期刊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全球多地地下水位正快速下降。据国外媒体报道，该研究汇总了40多个国家17万多口水井的数据，涵盖全球近1700个地下含水层系统。

数据显示，2000年至2022年间，71%的地下含水层系统水位下降，有617个含水层每年地下水位下降超过0.1米，占比达36%。其中，地下水位下降最快的含水层位于西班牙，每年下降中位数达到32.8%，地下水超采量减少85.5%，严重

赵勇表示，由于滥用化肥和农业化学品以及采矿、生活工业废弃物排放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地下水被各种有害物质所污染，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川加速融化，以及沿海地区过度开采地下水等则造成海水入侵和土地盐碱化问题。

联合国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气候变化、需求增长和供应受到污染，到2050年有超过50亿人可能面临缺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水网络”项目协调人豪尔赫·阿里亚加曾在采访中表示，墨西哥城的地下水开采速度是自然补给速度的2.15倍，长此以往，墨西哥城的地下水在未来四五十年将被开采完。

这一紧迫形势，无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陈飞强调，地下水具有水质稳定、分布广泛、易于取用等众多优点，能有效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但若过度取用地下水，破坏了自然平衡，会引发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水源枯竭、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严重后果。

“地下水运动规律复杂，动态变化缓慢，出现问题后难以快速恢复。”陈飞提到，以地下水超采引发的地面沉降问题为例，即使在地下水停采后，仍要持续数年之久，且会导致含水层固结压密，储水空间压缩，尤其是黏性土层产生永久塑性变形，难以恢复原状。因此，地下水治理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严峻性。

另外，地下水藏身于地表下，隐蔽性强，需通过专业性调查和监测揭示其行为

机制和规律，导致对它的认识还具有一定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也给治理修复带来一定难度。

地下水超采治理需久久为功

新一轮超采区划定成果显示，虽然近年来开展的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成效显著，但平原区地下水超采区面积仍有26.76万平方公里。“治理难度依然很大，健康修复任重道远。”赵勇说。

比如，黄淮海地区深层地下水长期超采引发地面沉降，直接影响城市基础设施(如高铁、建筑)的安全。干旱半旱区地下水超采导致地下水位下降，损害生态系统稳定性、生物多样性。赵勇表示，当前地下水管理工作还存在置换水源不足、地下水治理保护力度需持续加大等问题。

目前，我国地下水监测一期工程已经完成，全国监测井有2万余眼(水利部和自然资源部)，全国平均站网密度为5.8站/1000km²，但也存在覆盖度不均、分层监测欠缺、协同性不足等有待提升之处。赵勇建议，建立覆盖水位-水质-开采量的立体化监测网络，重点区域加密监测站点，完善监测预警与智能管控体系。

在赵勇看来，制定和落实地下水超采管理政策时，平衡用水需求和生态保护至关重要。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有刚性需求，另一方面，生态系统的健康稳定也依赖于充足的水资源。政策制定应